

建设农业强国的国际经验和中国探索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2023 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华 静 范璐杰

2023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后的第一年，也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局之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①，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摆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位置^②，这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当前，国内农业在国际竞争力、农业生产效率、科技创新能力、资源利用率、生产要素流动等方面依旧存在不足，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探讨如何加强建设农业强国、借鉴吸取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经验，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以“建设农业强国的国际经验和中国探索”为主题的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2023 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2023 年会”）于 8 月 16 日至 20 日在宁夏银川举行。会议由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宁夏大学联合主办，由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国内外 100 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600 多名专家学者，紧紧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的国际经验和中国探索”这一时代命题展开研讨，为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之路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方向。

一、建设农业强国的国际经验

在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农业强国建设要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思路，向世界农业强国看齐，学习借鉴农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尽快补齐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突出“短板”。梳理国际农业强国的发展经验，可以为中国建设农业强国的具体实施提供借鉴。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自然灾害频发、贸易政策不稳定、农业资源保护利

^①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新华社，第 31 页。

^②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13/content_5741370.htm。

用不充分等问题突出,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积极推动粮农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农业贸易发展,对促进全球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于爱芝在题为《中非农业贸易合作的趋势、制约与合作创新》的主旨报告中以油料产业为例,从贸易的事实和典型特征入手,论述了中非的油料合作趋势以及目前双边贸易合作存在的挑战和制约,并总结贸易合作最重要的是重视政府、国际组织、行业协会和私营部门等多主体协同,鼓励私营部门创新。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中心杨东霞和陈素华从域外粮食安全立法的发展趋势出发,总结了国际粮食安全的立法实践。他们指出,域外的粮食安全立法有丰富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首先,粮食安全的权利概念是粮食安全法律保障的基石,当前域外粮食安全主要通过“食物主权”“粮食权”实现其法律保障。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都通过立法积极维护国际粮食安全,解决国家食品和农业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其次,世界农业强国在重视农业供给的同时,尤其重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通过制订计划、政策等方式提升环境立法标准,将农业生产要素纳入环境立法规范,重点强调保护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性。再次,美国、英国、日本均十分注重农业供应链全链条监管,通过农业农村法治全方位保护农业和食品全产业链上下游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过程。最后,多国着眼于数字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农业发展。基于对域外主要发达国家粮食安全立法实践的分析,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完善中国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的主要路径:一是建立多层次粮食主权体系的基本法律框架;二是加强农业农村可持续法律机制建设;三是健全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法律制度;四是积极探索农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立法。

日本作为资源相对匮乏的农业发达国家,在统筹人多地少这一现实矛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曹斌就日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形成、类型、管理主体、使用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研究发现:日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方面属于无限责任组织,成员间利益联系紧密,相互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另一方面采取民主管理有助于保障全体成员的合法权益。同时,日本在落实新内生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覃梦妮和赵心童聚焦于日本“以内为主,内外结合”的新内生发展理论,梳理了其理论发展脉络,通过对宫城县仙台市伊豆沼农场的分析,构建了“自立—认同—参与—资源—创新”的新内生发展整体框架,总结日本新内生发展模式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路径。在人才振兴方面,日本长期关注农民专业技术与经营方面的教育,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各县设置农业大学。湖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白素香、横滨国立大学经济学院倪卉和龙谷大学经济学部河村能夫分析了日本京都府立农业大学入校学生生源及就业情况,梳理了其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学生就业促进举措。他们认为,中国的农业学校也应设置特色鲜明的专门农业学校,明确教学目标,丰富教学内容,强化理论与实践,对学生的毕业去向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帮助学生继续升入农业高等院校或者直接就职于农业企业,培养专业农业人才。

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许俊伟总结了近现代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俄国等主要国家农民合作的发展流变,他指出,美国在“新一代”农业合作社中重点强调对农产品分工的高度整合,实行封闭式管理,力图通过垂直联合的规模经济效应来增加收益,并及时向社员返还利润。德国农民合作社在现代管理上趋于企业化、数量上趋于下降化、规模上趋于大型化、经营上趋于专业化、分配上趋于多样

化。同时，德国为促进农民合作社的良性发展搭建了四轮驱动的保障体系：一是在欧盟框架下形成七层农民协会，保障农民主体地位；二是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三是构建了覆盖农业职业教育、农业推广、动物疫病检疫与监控、农产品流通、农业金融五大子集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四是依靠健全的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和私营信用服务系统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这些国家的农民合作发展历程对于乡村振兴下保障中国农民发展权具有借鉴意义。许俊伟提出，中国未来发展可以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升农村治理效能、优化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促进农民集体发展权的实现。

综上所述，中国应从本国实际出发，根据自身农业发展特点，借鉴各国的农业发展经验，真正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现代农业强国道路。

二、中国农业强国建设面临的突出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魏后凯指出，除供给保障能力外，中国农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不强，在生产效率、科技创新、资源利用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与世界公认的农业强国尚有一定差距。结合与会专家学者关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以及中国农业各领域的发展状况的讨论，笔者梳理发现，目前中国农业强国建设面临粮食安全基础尚不稳固、农业产业组织能力有待提高、城乡要素资源配置不平衡问题尚待破解、农业国际竞争力相对薄弱等方面的难题。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农业强国建设的困难和挑战所在，也是中国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应重点突破的方向。

（一）粮食安全基础尚不稳固

当前，中国粮食生产在资源安全与生态环境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粮食安全基础尚不稳固。在资源约束下，保障耕地资源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由于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高度依赖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以及长期采用“粗放型”耕地生产经营模式，耕地质量明显退化，基础地力后劲不足。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崔钊达和余志刚表示，传统的耕作方式如长期翻耕等对粮食可持续生产和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暴露，粮食产量增长速度趋缓。例如，玉米长期连作导致土壤加速退化，对耕地产能和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3，且面积在不断减少、质量在不断退化，部分地区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也十分严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查建平、郑少锋等从农业成本角度分析农地“非粮化”问题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使得农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农地租金上涨，致使种粮成本攀升，粮食生产利润空间狭小。在环境约束下，化学投入品的利用效率和垃圾、污水的处理率亟待提高，生态保护压力依然存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园园、柴朝卿等人发现，由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不断加剧，传统耕作制度下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率的农业生产模式会带来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耕地质量退化等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并且极端天气的频发对粮食生产也造成了负面影响，严重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稳定。

（二）农业产业组织能力有待提高

中国农业高度分散，产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低，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韧性亟待提

升，小农户仍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经营主体。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强和丘斌清指出，中国小农户数量众多，但组织化程度低，小农户农业生产面临生产水平低、粮食供应不稳定、机械化程度低等发展局限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提升农业产业组织能力的重要途径。目前，虽然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且成效显著，但整体上仍处于成长期，各类经营主体联合不够、协同发展能力不足、合作共赢关系不牢靠。小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目前尚不成熟，致使二者无法共同分享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带来的增值收益。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抓手，尽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表面上对产权进行了细分，明确农民对集体产权按份或按股占有，但仍存在由产权模糊所带来的农民处置权与占有权不对等问题。安徽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高歌分析发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引致产权细碎化和强排他性，导致农民滋生产权“幻象”，弱化了村庄集体行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背景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面临诸多问题，农业分散经营格局的内源困境亟待解决。

（三）城乡要素资源配置不平衡问题尚待破解

在城乡二元结构仍较突出的背景下，中国农村要素市场尚不健全，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流动受限，与农业强国建设对资源要素高效配置的要求也存在一定差距，同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相比有待完善。安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彭长生、黄兴宇等指出，一方面，中国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劳动人口老龄化和女性化趋势逐渐明显；另一方面，农村地区“老年人不愿种，中年人不会种，年轻人不提种”的现象普遍，“无人种地”“土地非粮化”问题突出。人才缺失、土地资源盘活困难等问题成为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障碍。与此同时，各类资源要素单向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使得城乡间居民收入、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服务供给差距加大，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增加。例如，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张锦华、龚钰涵以及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博欧指出，目前农村流动人口从最初的“个人迁移”模式转变为“举家迁移”模式，对优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在逐渐增加。但受到相对严格的户籍制度约束和相应的资源配置条件限制，流动人口无法在城市落户，导致其无法享有与市民同等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待遇，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陷入艰难境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肖雪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胡冰川发现，相比于城市，广大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偏低，养老抚幼资源供给还不够充足，养老服务水平较低，公共教育资源投入有限且质量不高。因此，在不平衡中促进城乡要素资源的再平衡，成为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困境。

（四）农业国际竞争力相对薄弱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地板、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黄线等均对中国农业发展形成制约。就世界农业强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农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价格、质量、信誉以及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其中价格是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孙林和徐闻缘表示，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出口企业处于“低价格加成率陷阱”之中，农产品在开放的世界农产品市场中竞争力明显不足。他们认为，提升企业出口定价能力的重大阻力是国际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受贸易双方空间距离、语言差异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中广泛存在

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现象，在此情况下容易产生低端产品驱离高质量产品的逆向选择，严重阻碍企业真实产品质量信息传递，导致中国制造长期面临低端锁定困境。此外，近年来，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农业政策与贸易规则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对中国建设农业强国提出了更多挑战。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天祥、臧星月和朱晶表示，国际范围内中国农业支持领域的诉讼和纠纷已步入高发期，不同案件对“黄箱”支持补贴测度的核心指标——市场价格支持的计算依据存在巨大分歧。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空间受到限制，未来农业支持政策受到的约束可能更多。

除以上难题外，中国农业强国建设可能在前沿科技应用推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等方面也亟待突破，囿于2023年会论文选题和会议时间的限制，这些问题未在本次会议中展开详细论述，学者和专家未来可以做进一步探讨和总结。

三、中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路径探索

中国要建设的农业强国，既要有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也要有基于现实国情农情的中国特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农业是基础、是支撑。因此，必须加快建设农业现代化强国，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农业根基。如何建设农业强国，与会者围绕不同主题开展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从短期来看，农业强国建设应尽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多角度提升农业产业发展韧性，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加快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从中长期来看，农业强国建设应以科技为引领，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强化科技支撑，加快农业绿色低碳转型，让中国农业在全球贸易市场中形成有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以下是对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探索路径的简要综述。

（一）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推进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建设，必须充分彰显农耕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农耕文明对建设农业强国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农业强国要“体现中国特色”“赓续农耕文明”^①。农耕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其所蕴含的人地和谐的生态思想、和睦互助的文明观念，积累的选育、栽培、储存的技术经验，创造的农事节气，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鲜明的文化基因。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刘晓萍基于农学典籍视角，从返本和开新两个角度探索强国之路：一方面，以《农政全书》为例，通过溯求其译介历程，充分彰显西向传播进程中中国古代农学典籍对国外重农学派和重农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强调典籍保护的重要性，倡导对外传播和交流，努力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促进传统农耕文明与以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为特征的现代文明相互融合。新征程上，要将发挥农耕文明的历史优势与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底板，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国家的重大战略。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何秀荣在题为《粮食安全观的国际启示》的主旨报告中，一方面从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

^①资料来源：《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光明日报》2022年12月25日01版。

深入分析了以人均 400 千克作为中国粮食安全基准线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从国际视角出发，强调要考虑不同国家的人口容量、饮食文化、消费习惯以及粮食的浪费程度等，避免对粮食安全的判断产生严重的偏差。耕地作为粮食生产之基，是维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最基本保障。查建平学者从保障耕地数量的角度出发，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冷热点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对比分析了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耕地“非粮化”的空间差异、空间关联和影响因素。他们发现，非粮食主产区耕地“非粮化”水平呈上升态势，而 2019 年以后粮食主产区耕地“非粮化”也有上升趋势。因此，他们着重强调，要加强耕地用途管制监管，遏制耕地“非粮化”进一步扩张，同时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建立健全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崔钊达和余志刚基于宏观双重视角的研究表明，需要在加强宣传以提高农户认知水平的同时，加快农地制度创新，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加大政策保障力度，构建新型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体系。

完善粮食安全制度框架、强化粮食安全治理水平是中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的关键。最低收购价政策、粮食安全责任制度等作为稳定粮食生产、保护和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的重要工具，其实施效果和改革调整效应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马俊凯、李光泗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钟钰利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后发现，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是督促地方政府不断推进粮食安全治理工作的有效途径，该制度能够有效强化地方政府官员的粮食安全责任意识，通过地方政府承诺显著提升粮食安全治理效果和治理能力。同时，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朱满德、严西南和李成秀利用 DEA-Malmquist 方法与双重差分模型指出，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小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建议坚持和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充分发挥该政策在提升小麦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红利”作用，同时加强育种研发和选育推广，并注重采取综合措施保障生产者的种粮基本收益和积极性，防范对粮食生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能冲击。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陈明就 2023 年 3 月国家乡村振兴局并入农业农村部等新一轮机构改革举措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从产业政策取向、县域城乡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土地制度改革等多方面阐述了中国农政变革的重要意义。

全面绿色化、低碳化的农业发展方式是破解资源约束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措施，其中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是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丁秀玲、陆迁和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立朋从资源节约角度出发，构建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分析框架，发现同群效应、人际信任水平能够显著促进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他们据此强调，为促进农户绿色生产以及提高技术扩散效率，应重视群体行为的作用，增加群体的信息交流和互助合作机会，营造相互信任的社会环境。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苏、陈义凯和周谷珍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以绿肥紫云英为例，基于江西省农户的选择实验数据，运用 Mixed Logit 模型从微观层面探究影响农户紫云英种植意愿的因素。他们认为，加大紫云英新品种研发力度，积极引导农户种植紫云英，能够充分发挥绿肥优势，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奚卉彤、许佳彬和李翠霞在研究中国奶牛养殖业过程中发现，构建“政府—市场—养殖主体”的协同发展机制对农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农业作为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农业的深度参与。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子明和李翠霞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

两者间存在以耕地经营面积为门槛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他们建议，应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性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引入绿色服务方式，全面推进绿色生产转型，同时鼓励土地规模化流转和集中连片流转，激发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协调抑制碳排放的巨大潜力。

（二）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发展韧性

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是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海南大学管理学院傅国华在题为《农业产业链运行中存在若干问题的再思考》的主旨报告中，重新思考了农业产业链运行的内在机制，就农业产业链概念发展、产业链利益链接、产业链的好处、链长制以及资源的融合创新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他建议要分类分层次构建人类产业链和跨国空间产业链，制定人类产业链标准，实现农业生产链上的利益同盟，重视农业产业组织的作用，做好农业产业链数字化管理，加强农业的“产+销”一体化。同时，英国约克大学管理学院贾甫对新发展格局下供应链管理进行了分析，发现新冠疫情对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新冠疫情背景下，食物供应链中断、居民收入和生计丧失、社会不平等现象扩大、粮食价格不均衡等问题突出。因此，各国政府一方面需将农业粮食体系韧性作为战略要素，多样化地开辟各种减缓疫情冲击的途径；另一方面要注重构建互联互通的农业粮食网络，改变供应源以及运输、营销、投入品和劳动渠道，克服疫情导致的供应链障碍。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第一，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基础上，调整优化各地农业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有助于更好地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江苏大学管理学院黄曼、庄晋财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李娟通过构建“要素禀赋—共生模式—共生组织—乡村产业融合”的理论框架，深入分析了无锡的芳阳农业和巢湖的“三瓜公社”的要素禀赋优势、共生模式、共生组织和乡村产业融合效果，认为应鼓励城市资本进入适宜的农业领域，培育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城乡要素主体，引导城乡要素主体积极调整共生关系。同时，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周洲和贾磊等通过分析浙江湖州鲁家村、渚山村、荻港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发现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加强对乡村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乡村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此外，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学武等学者提出了促进乡村产业绿色发展的创新路径：一是全面深入探查乡村产业发展要素绿色禀赋；二是创新与推广乡村产业绿色生产技术；三是架构乡村产业结构、产业规模、产业功能；四是创新与构建乡村产业绿色发展的推进机制，进而实质性推进乡村产业绿色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第二，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农业科技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江苏大学管理学院袁鹏和李洪波等发现县域农田宜机化水平能够提升农机户的农机服务供给概率，增加其农机服务供给环节数与供给面积。他们认为，要进一步提升农田宜机化水平，应对农田进行“小并大、短变长、坡改平”的改造，同时加强机耕道建设，扩大农机服务市场规模，促进农业生产全程农机服务供给。第三，建设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是培育和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强和丘斌清从农业经营体系出发，基于中国大国小农的国情，强调建设农业强国需要利用新型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互补优势，在二者协同发展的基础上，统筹规划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发展，健全多元主体

的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优化完善农业经营体系扶持政策，形成健全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梁亚文和霍学喜等从规模经营角度切入，基于 Meta 分析发现，土地规模经营、服务规模经营均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要因地制宜地推动“双规模”经营，通过服务规模经营打破土地规模经营方式中农业区位条件、农地制度等的限制，二者相互配合有利于充分释放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潜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紧紧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以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无疑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抓手。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能够加快农业信息交流和传播，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化水平和农民数字化素养。而且，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产业创新力和竞争力能够被数字技术激活，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绿色化转型。例如，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马蓉辉和李立朋认为，数字素养高的茶农可以利用互联网加强对有机肥的认识，多渠道了解商品有机肥使用安全风险评估知识以及政府相关激励措施，解决商品有机肥采纳过程中的难题，提升有机肥采纳意愿和商品有机肥采纳程度。安徽农业大学金佳利用安徽省六县的实地调研数据研究发现，电子商务的普及有助于提高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石荣和唐艺婧基于国际视角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他们认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需要开展差异化、动态化的数字农业交流和合作，积极改善农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对农民和农业从业人员的数字化技能培训，加强对数字化发展和绿色农业生产的监管和政策引导。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依托和必要举措。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温啸宇和彭超从理论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世界范围内集体农庄制度变迁经验，发现该制度存在忽视异质性和代际社员需求、缺失选择性激励约束以及消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等问题。他们建议中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在努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始终坚持公平的底线思维，加强政府引导与农民主体性相结合，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马平和王满旺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等方式，探索宁夏隆德县李士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多元主体的参与程度；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发展困境模型，发现当地村集体经济发展在政府、合作社、村干部、村民等层面存在制约因素。他们认为，提升多元主体的协同能力，强化政府对村集体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社会性力量构建稳定和谐的利益联结机制，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三）全面促进城乡要素流动

畅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是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要路径。一方面，需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另一方面，需要加快破除城乡之间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制度藩篱。

在教育方面，张锦华等学者从随迁子女教育准入视角出发，系统评估了流动人口长期留城的意愿以及市民化决策。他们指出，设置随迁子女入学门槛等公共服务相关的户籍歧视，并不是疏解超大城市中心区域劳动力和实现人口管制的有效途径。因此，为促进城乡教育服务均等化，流入地城市要解放思想、增加教育供给；各地要分层次自主探索教育制度改革；政府应加快完善居住证制度，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必须以相关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完善为条件，

做大并分好教育公共服务的蛋糕。

在养老保障方面，肖雪和胡冰川就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对于高龄、健康状况较差、无配偶的农村老年人来说，亲子同住仍是最优养老选择；但亲子同住会对低龄、健康状况较好、有配偶以及无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产生抑制作用。因此，他们建议在老龄化背景下针对不同农村老年群体构建多元化的养老体系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福利。

在劳动力流动方面，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国涛和张特从收入维度考察了农村居民的流动性，发现中高收入群体流动性相对稳定，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流动性较强。同时，闽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黄云凌在移民融入理论框架下探讨了居住选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他发现居住选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是通过社区能力等多个维度来实现的。居住地的经济社会属性会影响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和经济融入，社区的人口结构、居住环境也会与社会交往、组织参与和文化习得等产生关联，最终决定了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和心理认同。他指出，建设良好居住环境和加强社区服务，能够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给农民工家庭带来实质性福利和发展机会，因此要加快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确保农民工在城市落得下、稳得住、过得好。

（四）全面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提升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增强国际风险防控能力，深化国际合作，是中国积极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构建对外投资开放新格局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第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之一，需要充分发挥农业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强化在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农产品出口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提升农业品牌、质量和服务竞争力也是中国外贸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孙林和徐闻缘基于国际贸易中的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使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手工整理得到的地理标志食品数据库，探讨了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定价能力的影响。他们强调，中国食品企业应积极利用国外高标准高品质市场，主动提升生产技术，不遗余力提高自身食品的出口质量；同时政府要辅助增加对公共物品的地区质量声誉以及行业质量声誉的关注和培育，加强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打造区域公共品牌，通过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发挥品牌的扩散效应。

第二，在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等交织的国际背景下，把握好农业开放力度和节奏、增强农业风险防控能力对于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汇率波动是影响农业发展的外部因素之一。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周超、王家兴和米运生通过研究中国农业产业链的外汇风险暴露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强调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背景下，认识和防范中国农业产业链的外汇风险既要考虑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也要考虑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的异质性。此外，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孙东升在题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措施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的主旨报告中，重点强调了安全监管对于防范风险的重要性。他指出，对于出口国政府，要建立更加全面的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发布平台，帮助贸易企业了解食品安全监管的政策变化、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满足安全监管标准；对于出口国的行业协会，需要加强与中国行业协会的沟通，减少由信息不畅通引发的贸易问题；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中要时刻监督农产品和食品的质量问题，承担好社会责任。

第三，深化农业领域的多边交流、科技合作以及对外援助等，抢抓“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发展机遇，营造良好的开放合作氛围。例如，农业科技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重要领域，是促进中国和沿线国家深入合作交流、共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格格和马静等通过分析中国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的总体状况与发展趋势，结合安徽、广西、陕西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的成功模式，深入探究了宁夏开展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的发展路径。他们强调，宁夏应积极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利用区位优势，加强与中亚地区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拓展“走出去”的发展空间。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韶艳和景露利用GTAP模型研究了RCEP对中国农产品经贸的影响，发现RCEP的签署能够带动中国及其他RCEP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并且，随着技术性贸易壁垒削减幅度的增加，居民消费水平、福利水平以及总进出口额均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他们据此建议，要持续深化RCEP成员国之间的农业合作，充分发挥贸易创造效应，并制定分阶段、分程度、分产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削减方案，推动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

四、总结与展望

本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的国际经验和中国探索”这一主题，针对建设农业强国的国际经验、中国农业强国建设面临的突出难题以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路径探索3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通过总结农业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经验，可以发现，中国正处于建设农业强国“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目标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对此，参会代表深入剖析了中国实现农业强国的现实基础和主要障碍，并对如何稳固保障粮食安全底板、优化农业产业组织能力、破解城乡要素资源配置不平衡、增强农业发展内在动力和国际竞争力等问题给予较好的回应，为制定中国农业强国建设规划提供了决策参考。

中国目前面临着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的双重任务，学术界急需针对农业强国指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衡量农业强国的指标体系以及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强国的关系等问题做出进一步回应，避免理论内容的偏失影响到实际工作的实施。期待农业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相关理论和实践研讨，为更好地增加农民福祉、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助力中国农业强国目标的实现提供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尚友芳）